

传播符号学 ● ● ● ● ●

文化基因：范式、内涵与当代价值*

曾庆香 刘苏仪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文化基因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一是以理查德·道金斯为代表的基因学视角，提出“谜米”概念作为文化复制的基本单位；二是由卢姆斯登和威尔逊共同提出的社会生物学视角，创造了“文化基因”概念，形成“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说”理论体系；三是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特征/元素”概念，将文化基因定义为可识别或可定义的最小文化单位。这三种理论范式从不同维度折射出文化基因的本质：它既是文化中可识别的、有意义的最小单位，也是文化最小的功能单位、复制单位、传播单位，更是知识的最小单位。这些理论范式共同为探索人类文明演进规律提供了深邃的理论洞见。

关键词：基因，文化基因，谜米，文化元素，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说

Cultural Genes: Paradigms,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Zeng Qingxiang Liu Suyi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 research of cultural genes. The first is the genetic perspective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基因与永恒故事：新闻故事研究”（19FXWB021）中国社会科学院配套项目的中期成果。

represented by Richard Dawkins, who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meme” as the basic unit of cultural replication. The second is the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jointly developed by Lumsden and Wilson, wh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culturgen” and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theory”. The third encompasses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trait/e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defines cultural genes as the smallest identifiable or definable cultural units. These three theoretical paradigms illuminate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gen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y constitute not only the identifiable and meaningful minimal units within culture, but also the smallest functional units, replication units, and communication units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inimal units of knowledge. Collectively, these theoretical paradigms provide profound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exploring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gene, cultural gene, meme, cultural element,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theory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05

近年来,文化自信让“文化基因”成为大众的口头禅,那到底什么是文化基因?真正理解这一概念,需对其进行追根溯源。从词源上说,文化基因是对生物基因的仿拟。1866年,遗传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在他的豌豆杂交实验论文中提出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1909年威廉·约翰森(Wilhelm Ludvig Johannsen)正式提出“基因”(gene)概念。在生物基因研究的启迪下,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文化中存在类似基因的成分,并展开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设想,像建立基因学一样建立文化基因学(cultural genetics)(1952)。显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基因的概念只是一种隐喻。

文化基因是一个借自生物学的比喻性说法,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meme”和“culturgen”。国内外对文化基因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且到目前为止,文化基因的内涵仍未获得公认的界定和统一的认识(叶舒宪,2017)。

一、基因学视角下的文化基因：强调自我复制的谜米与谜米学

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出版，把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在文化传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东西定义为“谜米”（meme，又译模因、迷因、米姆、觅母、密母），即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概念，“曲调、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谜米。……谜米通过从广义上说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一个大脑，从而在谜米库中进行繁殖。……当你把一个有生命力的谜米移植到我的心田上时，事实上你把我的大脑变成了这个谜米的宿主，使之成为传播这个谜米的工具，就像病毒寄生于一个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一样”（1976，pp. 330 - 386）。道金斯强调文化基因像生物基因一样是文化复制单位，且谜米造词也是对生物基因（gene）的仿拟。“既可以认为‘meme’与‘memory’（记忆）有关，也可以认为与法语‘même’（同样的）有关。”（p. 192）道金斯认为，由于有谜米这种新的复制基因，人类才具有强大的自觉的预见能力，即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才进一步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谜米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pp. 200 - 201），即人类的文化谜米可以修正源于生物基因的自私性行为。总之，谜米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信息单元，包括思想、技术、理论、歌曲、时尚和传统，涵盖了所有形式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保存在个人的记忆中或外部人工制品（例如书籍、记录或工具）中，这些信仰、价值和行为通常是从他人那里继承而非独立发现的。谜米概念提出之后，涌现出一大批谜米研究者，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谜米学（memetics），且1997年5月起发行《谜米学期刊》（*Journal of Memetics*），每年两期。1998年召开了第一次谜米学研讨会。随后出现了专门的谜米网站和谜米学在线词典。在众多谜米研究中，代表性著作有布罗迪的《思维病毒》（Brodie, 1996）、布莱克摩尔的《谜米机器》（Blackmore, 1999）和迪斯汀的《自私的模因》（Distin, 2004）等。

总之，谜米学是研究谜米复制、传播和进化的理论和实证科学，其核心是谜米的“适应度”，即适应其传播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自然选择，更合

适的谜米将更成功地传播，“感染”更多的个体和/或在人群中存活更长的时间。谜米学是对传统社会科学视角的补充，传统社会科学关注的是交流的个体和群体，而不是交流信息本身。在许多情况下，对信息传播动态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演变的研究可以更简单地从谜米视角来进行，而不是通过分析传播主体的意识或无意识意图来进行。谜米学认为，谜米和基因一样，通过变异、选择和遗传，可以通过纵向即代际模仿/复制和横向即同代模仿/复制（从朋友到陌生人）传递信息，也可能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

谜米范式在中国的研究始于2003年。与国外谜米学关注文化进化的纵向与横向传播不同，中国研究主要聚焦于流行语和语言翻译的横向复制与变异，代表性研究如何自然、何雪林（2003），王斌（2004），徐盛桓（2005）等。由于我国谜米研究很少涉及纵向的文化进化与遗传，因此吴秋林认为谜米在我国不是指文化基因，而是成为流行语的代名词（2017，pp. 36-40）。

虽然道金斯的谜米概念是对基因概念的类比，但中国部分研究直接将生物基因理论平移至文化基因，典型的如闵家胤指出，文化遗传存在类似生物遗传的中心法则（genetic central dogma，指遗传信息从DNA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即社会-文化遗传的中心法则：文化→生产→文明。文化同文明的关系恰好就是“基因型”同“基因表现型”的关系。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遗传基因（S-cDNA），文明则是文化的社会表型。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最终决定社会系统的存在、停滞、变革和进化。（2010，pp. 12-13）徐才更将人类文化分为四大类，即本能文化、权能文化、智能文化和类能文化，分别对应着生物基因的四种“碱基”（A、T、G、C），四种文化所蕴涵的四种能力构成自催化、自合成的超循环运动，使社会具有了“发生即长存”的内在生命力（2016，pp. 142-143）。

尽管道金斯发明了谜米概念，并发展了谜米理论，但他并没有声称这个想法是完全新颖的。在理念上，他用生物基因的特征、规律研究文化基因，是受到社会文化进化论，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示（Laurent, 1999）。与达尔文同时代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马克思（Karl Marx）、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及之后的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学者，都曾将文化或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类比，认为思想有与生物相同的进化压力。如赫胥黎声称“生存斗争在知识界和物理世界中都存在”（Huxley, 1880, p. 15）。坎贝尔进一步借用进化论原理解释文化进化，创造了“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概念，提出知识进化

的三个阶段“盲目试误→选择性保留（遗传）→有序构建（变异）”，认为选择和变异是知识进化的基本机制（Campbell, 1974, pp. 413 - 423）。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更明确指出，自然选择绝不只是一个生物学定律；作为一个定律，它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有关生命和心灵的科学。他甚至提出了“社会遗传”（social heredity）的概念，借以描述个体通过模仿和教导从社会中学习的方式。（Baldwin, 2001, pp. 41 - 42）他们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即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从而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又称为社会文化进化理论）。

谜米概念和谜米学虽受追捧，但甫一出现就受到了批评，虽然有的批评是因为谜米理论忽视了其他文化研究领域，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成果，但更主要的批评是对谜米理论是否算一个有效的科学理论的质疑，如墨西哥学者路易斯·贝尼特-布里比斯卡将该理论称为“伪科学教条”，“一个对意识和文化进化的严肃研究构成威胁的危险想法”（Benítez-Bribiesca, 2001, p. 29），因为他认为谜米传播机制导致低复制准确率和高突变率，这使文化进化过程变得混乱。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则将道金斯的宗教谜米理论描述为“无稽之谈”，“甚至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一系列判断错误的达尔文隐喻中的最新一个”（Gray, 2008）。谜米理论虽存在争议，但其核心主张——文化单位在复制中实现演变，为理解文化遗产与创新提供了分析框架。

二、社会生物学视角下的文化基因：启动文化的基因与文化启动的基因

1980年，加拿大生物统计学家查尔斯·卢姆斯登（Charles J. Lumsden）和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 O. Wilson）创造了另一个表示“文化基因”的词“cultorgen”，试图利用从人类遗传学中借来的技术来分析文化进化，发展解释基因如何与文化变异相互作用的综合理论，并推断出人类思维的进化理论。他们的理论最完整的阐述是在1981年的著作《基因、心灵和文化：协同进化过程》中，扩展了威尔逊1975年在《社会生物学：新综合》和1978年在《论人性》中提出的议题：文化基因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因被物化而能在外部世界中观察到，并通过社会化得以传承。1981年，这两位学者率先提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说”（gene-culture coevolution）：“文化是由生物学上的需要而产生和形成的；同时，生物学特征又因对文化

□ 符号与传媒 (32)

历史做出反应的遗传进化而得以改变。我们已经建议可以将这个过程称为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 (Lumsden & Wilson, 1981, p. 1) 即文化的进化和基因的进化相互交织: 一方面, 基因限制和引导文化的产生和变化; 另一方面, 文化通过社会环境的变动影响基因变动的频率。例如, 人类之所以能说话, 是因为拥有能控制语言的基因, 即 FOXP2, 但如果没有文化因子的启动, 仅有 FOXP2 基因仍然不能保证人类会说话, 如被狼养大的人就不会说话 (孔宪铎、王登峰, 2010, pp. 10 - 11)。总之, 社会生物学家所创造的“文化基因” (cultorgen) 包括两种内涵: 一是从文化得来的基因, 即控制文化的生物基因; 二是直接接受文化因子影响的基因, 如语言基因、笑的基因、饮食基因和性行为基因等。两者都属于文化基因的范畴, 或都可谓之“cultorgen”。同时, 他们将“文化基因”界定为“文化进化过程中的遗传的基本单位” (Lumsden & Wilson, 1981, p. 27), 如某种宗教观念或道德法则。总之, 与“谜米”一样, “文化基因”是一个用来表示文化或文化进化的理论“单位”的术语。类似于生物基因, 它是一种可被重复或复制从而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 (心智品)、文化物品 (加工品) 或行为。

虽然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学说直到 1981 年才由威尔逊正式提出, 但此前已有学者探讨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互动关系, 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库斯·费尔德曼 (Marcus William Feldman) 和路易吉·卡瓦利 - 斯福尔扎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早在 1976 年就使用种群遗传学模型来帮助建立文化进化以及基因 - 文化共同进化的数学模型。基因 - 文化共同进化理论提出之后, 出现更多相关研究, 著名的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 和彼得·理查森 (Peter James Richerson) 在 1988 年出版的《文化与进化过程》, 此书聚焦遗传和文化因素如何在进化力量的影响下相互作用, 产生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他们使用人口生物学家开发的方法来论证文化进化理论, 这是对社会生物学的基因 - 文化共同进化论的补充。他们甚至论证指出基因与文化双重遗传也存在潜在冲突。

基因 - 文化共同进化理论旨在解释从基因到心理再到文化的全部现象, 并就不同的文化基因如何影响生物基因的适应性 (genetic fitness) 提供一个数学的解释模型。这一理论的最终结果几乎将文化现象都归因于基因: “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 忽略哪些刺激, 如何处理信息, 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 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 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 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 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 (Lumsden &

Wilson, 1981, p. 27) 虽然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理论认为“文化发明的压力, 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 最终改变着遗传纽带的强度和扭力”(p. 175), 例如, 世界上大多数人从儿童长大为成人后, 肠内乳糖酶的活性都会下降, 导致乳糖不耐受的症状, 但是在牛群被驯化最长时间的地区, 如北欧和非洲, 养牛人群中出现了乳糖酶活性的突变, 其活性大大提高, 乳糖不耐受概率明显降低。这种文化导致基因变异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为“文化马拉基因车”(海涅, 2021, p. 461)。但这一学派仍然认为最后的获胜者是基因, 比喻称“基因将文化束于系狗的皮带上”, 即著名的“狗皮带原则”(Blackmore, 1999, p. 57)。

相比谜米研究, 我国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研究文化基因的文献较少。孔宪铎、王登峰的《基因与文化》指出, 人类基因与文化之间有诸多因果关系, 如在新西兰对 400 多位男童的研究证明, 受过虐待的男童中只有携带一种低活性 MAOA 基因的人才会变得具有反抗性的社会行为(2010, p. 5, 转引自 Caspi & Mclay et al., 2002, pp. 851 - 854)。此文宣称, 基因创造了文化, 但是文化启动了基因, 如语言基因、笑的基因、饮食基因和性行为基因都是直接接受文化因子影响的基因; “人的第二本性——文化, 即使不是由基因直接决定的, 至少是与基因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人的基因控制了人的文化结构与形态”。(2010, pp. 8 - 9)

由于社会生物学所界定的文化基因, 与文化人类学家使用的旧术语“文化特征”(cultural trait) 所指几乎相同, 如 20 世纪 60 年代, 有文化学者建议把可以交流传递的文化微观单元称为“特质丛”(trait-complex) 或“行子”(actone) (韦森, 2003, p. 49)。作为理论单位, “文化基因”颗粒度不清晰, 又面临识别和定义困难。同时, 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理论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因为人类的内在信仰、决定和外在行为都受到遗传因素即基因的制约和指导, 那又如何理解人类的“自由意志”? 即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性产物, 具有极强的主体性和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张博树, 1988, pp. 129 - 132), 且文化基因的进化速度为生物基因所望尘莫及。诸多原因导致“文化基因”这个词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 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术语“谜母”和“文化特征”取代。虽然如此, 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理论仍然被不少学者认可、研究, 如美国学者内特尔(Daniel Nettle) 发文宣称, 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生物学的。如学习语言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特征, 但也需要适当的心理设施, 这是个人生物基因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06, pp. 137 - 152)。且仍有不少学者将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进行勾连研究, 只是战场主要转移至文化心理

学领域 (海涅, 2021), 聚焦于微观的某一基因与某一文化特征的关联。

卢姆斯登和威尔逊提出的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说虽存在“狗皮带原则”的理论局限, 但其阐发的文化与基因互动模型仍具理论价值。该理论构建了物质基础与文化系统相互作用的框架, 揭示了物质条件塑造文化形态、文化反过来重构物质存在的双向互动机制。

三、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基因：文化特征与文化元素

文化人类学一直认为文化传播的是文化特征 (cultural trait) 或文化元素 (cultural element), 因此, 文化特征和文化元素长期以来一直在人类学、民族学中被用作传播单位和文化分析单位, 且二者被视为同义词, 如文化特征被定义为文化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元素, 是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 (Gross, 1942)。美国人类学家德里弗 (Harold E. Driver) 和克罗伯 (Alfred Louis Kroeber) 也将文化特征界定为文化中可识别或可定义的最小单位, 也是文化的最小功能单位 (Lyman & O'Brien, 2003)。

对文化特征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爱德华·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的《原始文化》(1871), 其中的“制度”“习俗”便是具体的文化特征, 尤其“遗留物” (survivals) 类同于文化特征概念, 要求文化人类学者应将文化“解剖”成“它的细节”即最小的组成部分。同时, 泰勒指出, 正如一个地区的所有植物和动物物种的一览表代表了它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一样, 一个民族的一般生活的所有文化特征的清单也代表了这一民族的文化整体, 其“附着物” (adhesions) 也是具体的文化特征 (2005, p. 6)。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 文化特征和文化元素两个概念通常交换使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元素的界定与对文化特征的界定几乎一致: 文化的最小可定义单位 (Kroeber & Kluckhohn, 1952)。他们还认为, 将文化分析成其元素, 并追溯这些单独的单位, 是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克拉克·威斯勒 (Clark Wissler)、法兰兹·博厄斯 (Franz Boas) 都将文化特征等同于文化元素 (Lyman & O'Brien, 2003)。总之, 文化特征、文化元素既表现为作为物质的人工制品, 如陶罐, 也表现为作为非物质的行为举止、故事、概念等。赫胥黎将文化特征分为三类: 人工制品 (artifacts)、社会事实 (sociifact) 和精神事实 (mentifact, 或 psychofact) (Huxley, 1955, pp. 2 - 25)。

泰勒和克罗伯的论证 (Lyman & O'Brien, 2003) 显示, 文化特征、文化

元素是传播单位、复制单位，既能纵向遗传，也能横向传播；与基因一样，在传播过程中也容易发生重组、复制错误等，成为产生新文化特征的基础。显然，文化特征、文化元素实质上是文化基因。人类学学者同样研究某一文化元素转变为多种文化共享的扩散历程，以及不同文化共同具有某一文化特征的原因及演变，从而出现了扩散论、进化论。总之，这一范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的内部结构和文化元素的演变，且在分析某一区域的具体文化时，试图把其中的文化特征全部分析和绘制出来，即绘制某一文化的基因图谱，从而形成了文化区域理论（culture area theory）。（Wissler, 1927）文化特征、文化元素的切分标准是这一范式的文化基因研究面临的最大疑虑。

人类学范式的文化特征/元素概念在我国专指具有特色的文化成分，如最早使用了“文化基因”一词的米文平认为民族精神方面的风俗习惯如葬俗、发式等是识别一个民族文化源流的文化信息或文化基因，且认为文化基因是识别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特性，一经形成，就在其群体的心灵深处积淀为一种社会本能，具有更大的稳固性（1988，p. 55）。哲学学者刘长林进一步指出，文化基因是对民族文化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形态特征，规定着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形态特征，并且他归纳出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十种思维方式，如重关系、强调整体、重视形象思维、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等（1989，pp. 28 - 29）。文化基因是识别、界定一个民族特性的根本单位，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所独具的成分。这种观点一直在我国的文化基因研究中占主导，如叶舒宪也认为，文化基因是指构成特定文化共同体的独一无二个性的决定性因素，例如驱动玉礼器在中国生产和使用八千年的玉石信仰，显然具有文化基因的性质（2017，pp. 40 - 42）。虽然我国许多学者将文化基因界定为文化的基本因素、基本单位，但他们同时限定文化基因只是在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关涉人类文化基本或独特性质的那部分文化元素（杨春艳、吴秋林，2017，pp. 23 - 28）。

显然，国内这部分学者对文化基因的外延的理解比国外的谜米、文化基因、文化元素的外延要小很多，也与生物基因的概念不符，因为人类基因并不仅仅是人类所特有的那部分基因，还包括与其他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基因。事实上，人类与黑猩猩有大约98%的基因是相同的，与老鼠有92%的基因是相同的（海涅，2019，p. 18）。美国计算生物学家内森·谢夫（Nathan Schaefer）开发新算法，将现代人的DNA与已经灭绝的人类祖先的DNA进行更精确的对比，结果发现，现代人类基因组中只有1.5%到7%是独一无二的

(刘霞, 2021-07-20)。但人类基因学并不仅是研究这 7% 的基因组, 而是研究所有基因组。

除了文化基因的内涵, 我国人类学范式的文化基因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文化基因的特性。(1) 渗透性。如“文化基因作为文化的基本因素和思维方式, 渗透在科学、道德、宗教、艺术、法律、哲学等各个不同的精神现象领域, 贯穿于政治、经济、外交、生产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 并且规定制约着它们的形态和特质”(刘长林, 1989, p. 30)。(2) 规定性。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通过编码规定着本民族人的心理、性格、情感、气质等各个方面, 最终在大脑中形成原始意象即原型(周清平, 2016, p. 60); 如玉石信仰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 规定了君子“温润如玉”的性格特质, 也形成了“通灵宝玉”“木石前盟”这样的原型(叶舒宪, 2017, pp. 40 - 42)。(3) 复制性。这种复制是潜在的、相对自主的, 一旦启动, 就会自主凝结一切文化能量, 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形式的存在机制, 是不可逆转的。(吴秋林, 2013, p. 67) (4) 传递性。文化基因作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具有很强的传递性, 它一代一代地被人们继承, 不会轻易因政治、经济等的变革而变化。当然, 它并非绝对不变, 随着历史的演进, 也会发生相对缓慢的变更。(刘长林, 1988, pp. 29 - 31) (5) 普遍性。文化基因储存于记忆中, 因而任何属于这一文化的民族或者个人普遍共享相关的记忆, 如葫芦神话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 相关神话故事普遍存在于汉族以及中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记忆之中, 具有同类凝聚的力量。(徐杰舜, 2008, pp. 11 - 12) 这种普遍性的存在会对全民族产生广泛的影响, 任何成长于中华文化环境中的成员, 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罗大众, 都会在其影响下形成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桓占伟, 2017, p. 14) (6) 区隔性, 即上述独特性。正因为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独特性的要素, 所以它可以很好地区隔不同的文化, 同时能够充分说明不同文化之所以然。文化基因的问题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它能对每一个文化群体的特质做出理论性的因果解释。(叶舒宪, 2017, p. 38) 同时, 我国个别学者同样提倡绘制文化基因图谱, 如吴秋林认为文化基因不可能如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一样呈现, 但可用文化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来描绘该文化的基因图谱, 并揭示其演变规律, 如巫术可理解为文化基因的原点, 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则为文化基因节点(2013, pp. 66 - 68)。

总之, 文化基因的三种研究范式各有长处。基因学范式将生物基因的复制机制和遗传变异机制平移至文化基因, 强调文化基因的复制性, 如谜米学通过对谜米的自我复制来阐释人脑的进化、语言的产生、人类的利他倾向、

宗教的诞生等问题，非常具有想象力。社会生物学范式分别探讨生物基因对文化的影响和文化对生物基因的影响，其著名的理论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由于脑科学和影像学发展，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文化人类学范式既包括对文化结构的分析，也包括对具体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基因的描述，还包括对各种文化基因的产生、扩散、变异等过程的追踪，据此绘制文化元素的分布图并形成世界文化区域图。

四、文化基因：内涵与横切面、纵切面的表现型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既然文化基因是文化中可识别的、有意义的最小单位，是文化最小的功能单位、复制单位、传播单位，那么文化基因也是知识的最小单位。上述文化基因的具体形式，如赫胥黎提出的人工事实，即文化创造的物品、物质和技术等；社会事实，即影响社会行为的文化结构和组织，包括家庭、政府、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等；心理事实，即文化的共同观念、价值观和信仰，包括宗教、语言和思想等，都是从横切面对文化基因表现型的分类。笔者认为文化基因的表现型还可从纵切面进行分类。据此笔者将文化基因分为：文化原型、社会记忆、谜米。文化原型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沉淀在文化的最底层；谜米是一种最新出现的文化基因，漂浮在文化的最上层；社会记忆是一种悬浮于文化中层的文化基因，它由谜米演变而来，延续下去则成为原型。同时，正如生物基因存在着性状的多基因决定（生物的一个性状通常是由多种基因决定的）、基因的多效性（一个基因也可影响若干性状）、基因连锁（部分基因较多地连在一起）和基因家族（由同一个祖先基因经过复制和后续突变而形成的多个基因成员）等诸种现象（刘祖洞等，2013，pp. 54-55、135、320），文化基因同样具有基因连锁和基因家族现象，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限于篇幅，笔者对此将另文论述。

另外，针对生物基因而言，个体的一个细胞含有该个体全部的遗传信息，其中全部遗传信息又集中在细胞核。细胞是携带生物基因的基本单位。针对文化基因而言，个人含有该文化全部的遗传信息，其中全部遗传信息又集中在大脑。个人是携带文化基因的基本单位。

文化基因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系统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在微观层面把握文化演进的内在机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基因，既是学术探索，也是时代使命。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文明的文

□ 符号与传媒 (32)

化基因谱系,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坚守文化根脉,实现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在当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基因理论也为我们理解文明多样性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分析框架。不同文明的文化基因既有其独特性,也存在共通元素。这些共通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而独特的文化基因则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实质上是对文化基因共通性与独特性的辩证把握。

引用文献:

- 布莱克摩尔(2001). 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道金斯(2012). 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海涅,斯蒂芬·J.(2019). 基因与命运: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信念、行为和生活(高见,刘淑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海涅,史蒂文·J.(2021). 文化心理学(张春妹,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何自然,何雪林(2003). 模因论与社会语用. 现代外语, 2, 200-209.
- 桓占伟(2017). 研究民族文化基因应重视核心观念. 史学月刊, 11, 12-16.
- 孔宪铎,王登峰(2010). 基因与文化. 东岳论丛, 2, 5-11.
- 郎丽娜(2017). 文化基因研究的概念和历史.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8-13.
- 刘霞(2021-07-20). 仅7%人类基因组为现代人独有. 获取自 https://www.cas.cn/kj/202107/t20210720_4799190.shtml?ivk_sa=1023197a.
- 刘长林(1988). 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 哲学动态, 11, 29-32.
- 刘长林(1989). 中国民族文化基因及其阴性偏向. 哲学动态, 1, 28-32.
- 刘祖洞,乔守怡,吴燕华,赵寿元(2013). 遗传学(第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米文平(1988). 姬厥律即今鄂温克——兼论古民俗中的文化基因. 北方文物, 2, 54-59.
- 闵家胤(2010). 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学说.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0-16.
- 泰勒(2005). 原始文化(连树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斌(2004). 密母与翻译. 外语研究, 3, 38-44+80.
- 王学斌(2020-11-17). 中国文化基因的特质. 文摘报. 第6版.

- 威尔逊, 拉姆斯登 (1990). 普罗米修斯之火: 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 (李昆峰,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韦森 (2003). 文化与制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吴秋林 (2013). 文化基因新论: 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 民族研究, 6, 63 - 69 + 124 - 125.
- 吴秋林 (2017). 文化基因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徐才 (2016). 文化基因的内在机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演变. 理论探讨, 3, 141 - 144.
- 徐杰舜 (2008). 文化基因: 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9 - 14.
- 徐盛桓 (2005). 幂姆与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1, 59 - 67.
- 闫祥岭, 白靖利 (2014 - 09 - 11). 时评: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新华每日电讯. 第2版.
- 杨春艳, 吴秋林 (2017). 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吴秋林教授访谈录.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22 - 28.
- 叶舒宪 (2017). 神话观念决定论与文化基因说.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38 - 42 + 145.
- 张博树 (1988). 从“基因决定论”到“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观——人类社会生物学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 4, 127 - 136.
- 张莹 (2003). 从觅母的角度谈异化翻译的趋势.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6, 127 - 136.
- 周清平 (2016). “互联网 + ” 模式中现代影像艺术文化基因的融合与裂变. 电影艺术, 1, 60 - 66.
- Baldwin, J. M. (2001). *Darwin and the Humanities*. Bristol: Thoemmes Press.
- Blackmore, S. (1999).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ítez-Bribiesca, L. (2001). Memetics: A Dangerous Idea. *Interciencia*, 26 (1), 29 - 31.
- Boilès, C. L. (1982). Processes of Musical Semiosi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14, 24 - 44.
- Boyd, R. & Richerson, P. J. (1988). *Culture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pbell, D. T. (1965).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In H. R. Barringer, G. I. Blanksten & R. W. Mack (Eds.),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Areas: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 19 - 49. Cambridge: Schenkman.
- Campbell, D. T. (1974).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R. Popper*, 412 - 463; LaSalle, IL: Open Court.

□ 符号与传媒 (32)

- Caspi, A. & McClay, J., et al. (2002). 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 *Science*, 297 (5582), 851 – 854.
-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M. W. & Cavalli-Sforza, L. L. (1976).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ary Processes, Selection for a Trait under Complex Transmission.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9 (2), 238 – 259.
- Gray, J. (2008 - 03 - 15). The Atheist Delu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8/mar/15/society>.
- Gross, N. C. (1942). *The Diffusion of a Culture Trait in Two Iowa Townships* (Master's thesis). Iowa State College.
- Huxley, J. S. (1955). Guest Editorial: Evolution,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Yearbook of Anthropology*, 2 – 25.
- Huxley, T. H. (1880).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Science*, 1 (2), 15 – 17, 20.
- Kroeber, A. L. & Kluckhohn, C.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
- Laurent, J. (1999).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Memes” / “Mnemes”. *Journal of Memetics*, 3 (1), 14 – 19.
- Lumsden, C. J. & Wilson, E. O. (1981). *Genes, Mind, and Culture: 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yman, R. L. & O'Brien, M. J. (2003). Cultural Traits: Units of Analysi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59 (2), 225 – 250.
- Nettle, D. (2006). Languag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Specialized System for Soci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J. C. K. Wells, S. Strickland & K. Laland (Eds.), *Soci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Human Biology*, 137 – 152.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 O'Brien, M. J., Lyman, R. L., Mesoudi, A., & Van Pool, T. L. (2010). Cultural Traits as Units of Analy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5 (1559), 3797 – 3806.
- Wissler, C. (1927). The Culture-area Concept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6), 881 – 891.

作者简介:

曾庆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传播符号学、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研究。

刘苏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

Author:

Zeng Qingxiang, Ph. D. ,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13683318729@163.com

Liu Suyi, Ph. 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845438733@qq.com